

中国高端养老机构的田野反思

By

2020 OYCF-Chow Fellow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 吴江江

(March 1, 2024)

很多研究者都在田野的过程中与当地的人和事发展出深厚的感情，而对我来说，离开田野时感到的却是一种巨大的如释重负。在进入田野之前，我曾多少认为这个与照护相关的田野更多的应该是温情和联结。然而，尽管我所调研的这种照护商品在多数情况下受到了它消费者的认可和欢迎，可它却让我看到了机构养老语境下比温情或联结更为复杂的照护实践，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运作。

从2020年9月到2021年10月间，我在上海的两家所谓的“高端养老院”里开展了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虽然时常被笼统地称为“高端养老院”，但这些照护机构有一个更为专业的别名，即持续照护养老社区（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ies，或CCRCs）。与传统养老院主要提供给卧床老人的护理服务不同，这些高端机构根据居民的身体状况划分居住区域，着重于给那些仍保持独立生活能力的老人提供服务。在这些养老社区，独立区往往是最大的生活区域，这里提供全方位的日常生活服务，如清洁、餐饮、活动和基础医疗，使得养老院的生活宛如在度假村。高端的服务质量和生活设施让这样的机构价格不菲，时常需要至少一两百万的基础入门费，外加每月可达一两万的居住和服务费。对一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来说，有时也需要卖掉一套房产才能负担得起这种养老方式。

因为孝道和家庭养老的传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养老院主要是为那些没有家庭照护资源的老年人所设。历史上所谓的孤独园、残老院、救济院、安老所，收容鳏寡孤独，或将孤独无依的老人和其他残障人士共同集中管理，往往让所谓的养老机构被视为可怜和悲惨的象征。即便今天，人们对于养老院的主流印象仍然以负面为主。在主流话语中，养老院往往象征着不可逆的衰弱、死亡、社会隔离，同时，由于多数养老院在政府补贴和盈利能力方面的总体欠缺，照护工作者的资格、老人的生活质量等问题总是让人们对于这种养老方式望而却步。在人们的主流想象和新闻报道中，养老院常常是虐待老人的高发风险区。通常，即使当人们知道我在研究所谓的“高端”养老院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仍然围绕在长期照护环境中的老人安全和照护质量等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这些养老院里的照护员工在社会结构中并非弱势群体。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从事照护工作的劳动力一样，中国的养老院护工也多来自于欠发达地区，在社会结构上属于边缘、底层群体，也易于成为社会投射虐老恐惧乃至污名的对象。但无法忽视的是，在封闭的照护机构中，尤其是那些针对中下层老年人的“非高端”机构中，老年人处于体力和权力的绝对弱势地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调研的“高端”养老院里，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明确的权力关系，只不过相比关于养老院的主流想象，这种关系倒了过来。照护者，尤其一线员工，往往处于弱势一方，而作为被照护者的老人，因为他们高端照护消费者和社会中上产精英的身份，则往往在照护关系中拥有极大的权威和话语权。高昂的费用和机构极力塑造的高端形象让作

为商业机构的养老社区对他们的客户极为顺从。同时，独立区居民因为身体相对健康，也有空闲，无论是维护个人作为消费者的权益、个别人的无理取闹、或是居民之间的矛盾，都时有发生，都需要员工以灵活的人际技巧应对，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对作为尊贵客户和社会精英的老人们恭敬有礼。也时不时让这群人成了员工口中“难搞”的对象。

老人的权威在机构制造的家庭式照护话语的加持下，时常迫使员工承担不属于他们的照护职责。在我调研的两个机构的独立生活区，那些主理协助居民日常生活的一线员工时常被比作老人的“儿女”。“专职儿女”、“亲如儿女”之类的话语在这类高端机构中很常见。这样的称呼，以及其延伸出的照护关系，一方面拉进了老人与照护者之间的关系，但一方面也无形中增加了员工在面对社会阶级地位远高于自己的老人时的压力。为了维持这种家庭式的亲切照护形象，也由于担心得罪社会地位远高于自己的客户，不少员工都会在一些模棱两可的请求上选择接受而非拒绝，比如下班路上顺道帮居民买一样只有某个商店才有的日用品，比如帮助腿脚不便的居民收衣服。严格说来，这些都不是一线员工分内的照护职责，尤其对独立区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来说。这样所谓“过度服务”的问题，在我调研的两个机构中都普遍存在。“过度服务”以及对老人的顺从并非局限于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日常小事。我所在的一家机构，曾有一名老人因为希望获得特殊优待而时常用小恩小惠贿赂员工。有些员工较为善于应对周旋，有些则不然。一名当时与我较为相熟的经理就因为不善处理这种关系而选择对提出非分要求的居民网开一面，比如给她极为宽松的门禁限制，允许她用社区厨房的资源给自己开小灶等等。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但最终导致免职也是她只能独自承担的后果。而那位居民，因为她对社区和公司的巨大经济价值，则得以在社区里安之若素地生活，除了不再拥有特权之外无需面对任何实质性后果。

在田野中作为一个一线员工，这种照护中权力关系的重量时常让我感到压力，也让我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也无法全情投入到我曾认为值得向往的照护工作中去。主流话语往往将照护活动和道德上纯粹的善联系在一起，然而具体的在地实践则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照护的复杂性、多面性，尤其是在照护商品化的过程中。不过，也是这种疏离感和当时尚未厘清的诸多困惑让我在田野结束时感到莫大的轻松。

其实，不平等的照护关系带来的不仅是照护工作的异化。我的很多老年受访者也曾多少表达过对此的失望。当员工因为等级压力而扮演亲切顺从的照护者，他们为维护个人尊严和主体性，时常刻意对照护工作保持一种心理距离。如他们常说的，“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工作一旦结束，这种情感劳动也就结束了。一些老人也是在这种断裂的关系中意识到，他们尽职尽责的“小伙伴”、“专职儿女”，最终只不过把彼此间的关怀和真诚当做一份表演性的工作，仅此而已。照护的本质是社会个体的互相依存

(interdependence)、是一种关系性 (relational) 实践。这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高端照护商品，其塑造的老人和照护者之间的关系，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的互相依存的方式吗？

在中国语境中，虽然很多我遇到的中上产家庭认可这种“高端”养老，或至少接受其作为为数不多的养老选择中较好的一种，但这种商品中包含的等级式照护关系，真的是我们可

以为老龄危机找到的最好答案吗？这种商品化的精英式养老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好的照护？当“养儿防老”的叙事逐渐被“以房养老”、“保险养老”取代，一小部分精英阶层在其中找到了人生历程的解决方案，可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想象养老和照护？出生率和人口下降所带来的老龄危机不仅存在于中国，这些复杂的问题也很多层面上对其他社会和文化也有普适性。

不过，虽然在田野过程中有那种难以名状的疏离感，转眼两年过去了，在我写完论文的时刻回头去看，某种程度上也前所未有地对那些田野和工作的回忆感到亲近。或许不远的未来我的父母也会成为我曾服务过的老人中的一员，我又会以一种客户、家属的身份“重回”田野。又或许，他们会觉得高昂的价格不值而选择其他的养老方式。而我相信，在看待他们的选择时，我会不可抑制地将其与我的田野见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和思考可能更为复杂，掺杂着学理上的追问和实用性的考虑，也包含着对个人及其家庭特权或弱势的衡量和反思。在这种程度上，我的这种亲近感，大概也不全是对田野的亲近，而是因为这件事的切身性。这一次，我不是一个研究者、观察者，或某种程度上的局外人。这次，我就是关于养老和照护的“田野”中的一人，这一点，大约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